

暨南中文新知文丛

赵维江 主编

现代汉语动量词 与动词组合研究

周娟 著

动量词是汉语量词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类。

动量词与动词的组配，并不是简单的“习惯性搭配”，
而是包含着一些潜存的理据与规律。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周娟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8

(暨南中文新知文丛)

ISBN 978 - 7 - 5668 - 0237 - 8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汉语—词类—研究 IV. ①H14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0021 号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

著 者: 周 娟

丛书策划: 史小军

责任编辑: 杨华容

责任校对: 卢凯婷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3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4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赵维江

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描述，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知识爆炸”，实际上这一认识并不准确。“知识”和“信息”是两个不同而又相互交集的概念，知识肯定是一种信息，但不能说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在互联网风行的今天，我们确实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新知识的实质性增长不可能短时间内迅速地膨胀，因为知识的创新需要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而信息则不一定需要。造成这一误区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伪知识”的存在，由于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上“复制”与“粘贴”功能的便捷，难以计数的依靠抄袭、拼凑或翻新而产生的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所谓论文、专著被源源不断地炮制出来。由此来看，真正的“知识”在今天远远没有达到“爆炸”的程度。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同样是如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暨南中文新知文丛”。该丛书包括十种学术专著，内容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训诂学、语法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戏剧文学及文化学、民俗学等不同的领域。原创性是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其研究目标皆为目前学术界尚未了解或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其中有些课题十分新颖，为前人所未曾涉足或极少论及；有的课题虽然已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但本丛书中的著作在系统性和综合性方面无疑仍具开创性。该丛书中无论文集或拼盘式的著作，皆为逻辑严密的学术性理论探讨。与此相关，这套丛书的多数著作体现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和理性的思考深度。这些思考有的可能显得比较稚嫩，或不够完善和深入，甚至有的观点和材料日后可能被发现是谬误，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新知”被载入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积淀层中。

2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

真理没有终极,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发现真理、充实真理和纠正谬误。人文学科相对于自然科学缺少明确的真理量化尺度,所以也更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说到“新知”,人们往往将之与“旧学”相提并论。当年蔡元培评价胡适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其实,“邃密”了“旧学”,使之有了新品质,“旧学”便也有了“新知”的特性,“加”便是创新的过程。我们讲“新知”,要义在于强调研究的原创性。开创一个未知的领域固然好,但在今天科学研究体系已相当完备的情况下,一些传统学科已很难发现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多数时候需要在前人已开垦的土地上深入开掘或进一步扩展。这也无妨,只要你有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仍然会有新发现、新收获。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一个“新”字,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学者,数十年皓首穷经,可谓勤勤恳恳,可能著作等身,但只是在已有材料上做低层次的重复劳动。尽管题目、角度不断地变化,却没有什么新发明,提不出新思想、新观点,这样的成果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新知”,就连“旧学”也称不上,因为“旧学”是前人创造的“新知”。在今天整个社会严重功利化,学术界普遍心浮气躁而成果又相对容易发表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新作实际上没有什么新的思想。真正“新知”的产生需要艰苦的劳作和认真深入的思考,人文学科更是这样,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反复思考、细心斟酌、不断修订的过程,不仅身子要坐得住冷板凳,更要有精神上“十年磨一剑”的淡定。同时要坚守学术的“新知”品格,还需要抵挡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古代的学问家往往要么是在位或致仕的官员,要么家境殷实,他们是有了钱(起码衣食无忧)或做了官才去做学问;而今天情况相反,学者一般是做了学问才有钱,“学而优则仕”(或“仕而学则优”),所以必须“大干快上”,让他们去做“名山事业”,难矣哉!不过难非不能也,只要我们愿意,“簞食瓢饮”也乐在其中。这是我本人对于学术的一点理解,也是对在这套丛书中创造了“新知”的作者们的一点期望。

暨南大学中文系是一个有着八十五年历史和优良学术传统的学系,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詹伯慧教授开创的汉语方言学和饶芃子教授开创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成为学界“品牌”;蒋述卓教授领军的文艺学目前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各个研究领域已得到了整体性的显著发展,去年终于获批为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更令人欣喜的是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学术“新人”。当年本人搵食暨南时已年过不惑，可在系里还属少数拥有博士学位的“新人”。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今天中文系的情况已大为改观，教师队伍已经“博士化”。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近几年进入我们这个团队的年轻博士，其中有的是我曾教过的学生，有的是经我手引进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师从不同的导师，从事不同的专业研究，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这套“暨南中文新知文丛”的推出是一个标志，昭示着暨南大学中文系后继有人，可期厚望。来到暨南大学这些年，特别是近五年主持系务后，我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系里的学科建设上，有时为个人的研究工作被耽误而感到苦恼和无奈，不过想到能为中文系的发展做点事也就释然了。虽然自己老之将至，但看到年轻人的成长，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今天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学术平台为年轻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他们的一个学术总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动力，相信更多更好的“新知”将在新一代学者们手里创造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建设项目负责人、文学院院长王列耀教授及我的同事和搭档、现任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小军教授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2年3月20日
于暨南园一叶庐

序 言

邵敬敏

在我招收的几十名博士生里，要数姓周的最多了，前前后后居然有六名：华东师范大学的周有斌、周静、周红，加上暨南大学的周芍、周日安和周娟。学生们开玩笑说：“老师，你跟周姓肯定有缘。”呵呵，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娟者，明媚美好也。中国人给女孩子起名字，常常喜欢用这个“娟”字。周娟是个湘妹子，本来是我的老朋友杨启光教授的硕士生，毕业后就留校了。2002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暨南大学时，她已经是中文系的教师了，所以也是我的同事，校龄比我还长。

周娟为人朴实无华，做事踏踏实实。原先只觉得她比较寡言少语，后来接触多了，才发现其实她很有主见，看问题往往能够一语中的。这几年周娟成长很快，先是讲师，很快就晋升为副教授。近年来发表了二十来篇论文，最近还连续拿到两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如果说当年她还略显“稚嫩”的话，那么现在显然“成熟”了。尤其在语法研究方面，可以说已经登堂入室了。她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思考与追求，在现代汉语语法、方言语法以及当代汉语的变异研究等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周娟还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现代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她是我这些合作者中出力最多的，不仅具有良好的语感，而且能够挖掘出湖南方言语法细微而有趣的规律。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在我的工作和研究中，周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是在我组织过的不少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中，包括211工程项目建设、语言学科的建设、现代汉语国际语法研讨会、汉语语法南粤论坛等

2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

等，她都是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每次会议她几乎都是担任秘书组的组长，可以说是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而且还往往负责会后的总结报告、通讯报道的撰写。

其次是自从我被选为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后，周娟就义不容辞地担任了学会的秘书。我们是个穷学会，省社联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完全靠一点点可怜的会费以及自己拉来的赞助支撑着。原来的专职秘书也撤销了，所有的工作都由周娟来承担，包括制作财务报表。我们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完完全全是义务劳动，周娟为此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

我历来主张，要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道德文章，第一是道德，第二才是文章。周娟博士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这次，她的博士论文修改后得以出版，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量词是汉语，也是汉藏语系语言重要而鲜明的语法特征。长期以来，汉语量词就因其独特的词类地位而在语法学界受到高度关注。尽管量词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系统，然而，由于动量词在数量上没有名量词丰富多彩，其组合情况似乎也没有名量词那么复杂多变，因此，汉语量词研究一直呈现出“重名量而轻动量”的局面。其实，相对于名量词而言，动量词自有其个性特点，它们与动词的选择组合会涉及各种因素，尤其跟动词的语义特征密切相关，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先后写了两篇关于汉语量词研究的论文，都发表在《中国语文》上。一篇是关于名量词与名词的选择，一篇是动量词与动词的选择。后者提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想法，主要是语义的双向选择以及结合语义特征对动量词和动词进行多层面的分类。尽管如此，由于时代的局限，我当时只是粗线条地勾画了有关研究的线索，没有展开详细深入的讨论。

周娟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动量词与动词的选择组合进行研究，是很有眼光的。该项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遵循“五个结合”的研究原则，即形式与意义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事实与理论相结合，对动、量组合规律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该文在方法论上，强调动量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双向选择性原则，包括语义一致性原则、语义自足性原则和语义决

定性原则，从而保证了组合规律的可靠性与解释性。我认为该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

(1) 根据“有界无界”理论来解释汉语动词的界性特征。它指出一个动词能否与动量词相组合，首先决定于它的界性特征，从而建立了动词的界性分类系统，主要包括四类：前界动词、后界动词、双界动词以及无界动词。

(2) 论证了动量词的本质及其形成理据。它指出动量词是有界动作的动量属性在语言层面的投射，或者说是有界动作的动量标记。动量是有界动作在时轴上出现次数的量或持续时长的量。现代汉语动量词的形成，都是因为它们具有标示单位动作过程边界的功能。

(3) 全面分析了动词和动量词的选择组合规律。这跟动词的语义特征密切相关，也跟动量词的语义功能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以把汉语动量词分为计数量词、计时量词、数时量词、工具量词、结果量词、情态量词，并建立了动词和动量词组配的流程系统。

(4) 探讨了句法和语用调控对动、量组合的作用。动词和动量词能否组合，不仅跟二者内在的语义特征密切相关，而且跟句法和语用上（上下文语境和句类等）的调控有密切联系。通过对计数量词、计时量词、数时量词与动词组合时句法和语用调控的考察，解释了其中的规律。

该文是国内外第一次对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的组合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分析的著作，语料丰富，论证清晰，条理清楚，结论可信。既吸收了前人对此课题研究的经验和优点，又在规律性、系统性、创新性上有着明显的突破，该研究对于人们深入认识汉语动量词的组合规律和特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对外汉语量词教学和量词词典的编纂等方面也有重大应用价值。

当年朱彦博士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我在为她写的序里提出三点希望：取法其上、锲而不舍、细水长流。现在周娟的博士论文也即将出版，我也有三点新的希望：

第一，熔为一炉。我们必须具备多元意识，不管你是哪个学派，只要对我有用，我就学习，就拿来，根据汉语的特点，各取所需，熔为一炉，为我所用。

第二，与时俱进。不要学驴推磨，原地打转，而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4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

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推出新意。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才有希望。

第三，坚持特色。如果我们不引进、不借鉴、不跟国际接轨，那就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还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以我为主。只有坚持用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向世界。

这三点，愿与周娟共勉。

2012 年元宵节
写于暨南大学明湖苑乐研斋

目 录

总 序 赵维江 /1

序 言 邵敬敏 /1

第一章 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述评 /1

第一节 早期的静态研究：立类与分类 /2

第二节 中期的动态研究：语义特征与双向选择 /5

第三节 后期的多元研究：功能、认知和语法化 /7

第四节 动、量组合研究展望 /10

第二章 理论方法与动、量组合研究框架 /12

第一节 理论前提：以语义语法理论为主，以认知功能语法为辅 /13

第二节 界性理论与量范畴的形成 /15

第三节 汉语动词的界性分类 /18

第四节 动量词的本质、形成理据及分类 /24

第五节 动词与动量词的组合流程 /27

第六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和有关说明 /29

第三章 计数量词“次”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34

第一节 动量词“次”的来源与发展 /35

第二节 现代汉语中“num + 次”对动词的语义选择 /45

第三节 “num + 次”与动词组合的句法和语用调控 /49

2 现代汉语形名组合研究

第四章 计时量词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61

第一节 计时量词概述 /62

第二节 “num + 时量词”与动词的语义选择 /66

第三节 “num + 时量词”与动词组合的句法和语用调控 /76

第五章 数时量词“下”、“把”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90

第一节 数时量词“下”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91

第二节 数时量词“把”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23

第六章 工具量词、结果量词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33

第一节 工具量词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35

第二节 结果量词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50

第七章 情态量词“番、通、气、顿”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67

第一节 “番、通、气、顿”的表量共性 /168

第二节 “一番”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69

第三节 “一通”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76

第四节 “一气”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82

第五节 “num + 顿”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88

第六节 小结 /193

第八章 情态量词“遍、趟、场₁、场₂”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95

第一节 “num + 遍”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196

第二节 “num + 趟”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206

第三节 “num + 场₁”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210

第四节 “num + 场₂”与动词的选择组合 /213

第五节 小结 /217

第九章 状位“num + 动量词”的语义功能及其与动词性词语的选择组合 /218

第一节 状位“num + 次”的语义功能及其 与动词性词语的选择组合（个案一） /219

第二节 状位“num + 时量词”的语义功能及其

对 VP 的语义选择（个案二） /231

第三节 “num + 动量词”状位与补位功能分化的认知解释 /246

第十章 总 结 /251

附录 搭配理据和规律：汉语量词词典编纂的核心 /256

参考文献 /269

后 记 /279

第一章

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述评

2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

汉藏语系的绝大部分语言都有量词的语法范畴,丰富而独特的量词,更是汉语重大而鲜明的语法特征。然而,受西方印欧语语法框架的影响,长期以来,汉语量词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汉语词类的大本营中,量词是最后划类、定名的词类。虽说有关汉语量词的研究早已展开,然而真正在句法层面进行组合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了90年代,随着传统研究思路的突破以及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兴起,汉语量词及其组合研究才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 汉语量词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部类系统,然而由于动量词在数量上没有名量词丰富,其组合情况和表意功能似乎也没有名量词复杂,因此,汉语量词研究一直呈现“重名量而轻动量”的局面。^② 其实,相对于名量词而言,动量词自有其个性特点,它们与动词的选择组合呈现出特定的特征与规律,很值得深入研究。在进一步展开系统研究之前,本章拟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

汉语学界关于动量词以及动量词与动词的组合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早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静态研究;中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动态研究;后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现在)的多元研究。静态研究是一种“单视点”研究,着眼于量词的立类和分类;动态研究是一种“双视点”研究,着眼于动量词与动词语义的双向选择;多元研究是一种“多角度”研究,着眼于功能、认知和语法化的探讨。

第一节 早期的静态研究:立类与分类

一、量词的立类

在欧美传统语法中,量词没有独立立类,八大词类中没有量词。受此影响,汉语量词立类较晚。最初人们是把量词当名词看待的。例如,《马

① 周芍:《名词与量词组合关系研究说略》,《汉语学习》2006年第1期。

② 邵敬敏:《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中国语文》1996年第2期。

氏文通》和《新著国语语法》中，量词都没有独立的词类地位。《文通》中量词被看作表“记数别称”^①的一般名词，《新著》中量词也被看作“表数量的名词”^②。此外，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38）、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82）、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85）等都把量词看作名词的一个小类，称为“助名词”、“单位词”或“单位名词”等。到了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才逐渐改变量词作为名词“附庸”的地位，第一次把量词作为独立词类来处理。在高氏的词类框架中，量词是分“数位词”和“次数词”两类归入“范畴虚词”的^③。尽管高氏的处理还没有完全摆脱印欧语语法的束缚，但他第一次确立了量词独立的词类地位，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在高著的影响下，50年代中期，经过词类问题大讨论，人们终于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中明确指出，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数量单位的词，它与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一起归属实词类。这样，量词在汉语语法系统中才算是科学地确定了它的词类地位，也才算是真正独立立类并正式定名了。

二、名量与动量的区分

与量词词类地位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是名量与动量的区分。在早期文献如《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语法》中，都既没给量词独立立类，也没区分名量和动量。到了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他们虽然仍把量词看作名词的一个小类，但实际上已意识到这种“特殊名词”可分为两类：一类表示事物的数量单位，另一类表示行为的次数或行为的单位。到了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这部著作不仅区分了名量和动量，而且把名量词和动量词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同看待，单独立类。尽管高氏的处理有点“矫枉过正”，但这已说明当时人们对名量和动量的区分有了更明确的认识。高氏之后，随着《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确立，名量词和动量词作为量词小类就真正在汉语词类系统中找到了它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页。

② 黎锦熙：《新著国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1页。

③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0~185页。

们应有的位置。

三、动量词的内部分类

随着动量词在汉语词类体系中位置的逐步确定，人们也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了一定的分类。例如，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根据动量词的来源把动量词分为“专用动量词”、“工具动量词”和“同形动量词”^①；王力《中国现代语法》首先从表意功能出发把动量词分为“纯然表次数的动量词”、“兼表历时之久的动量词”、“兼表历时短或突然的动量词”，然后又从性质出发把动量词分为“专用动量词”、“借用动量词”和“离合动量词”^②。此外，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86）、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979）等也都对动量词进行了下位划分。这种单纯的分类描写，虽说明当时人们还没有找到对动量词研究的合适通道，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动量词的特点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这部著作不仅对动量词进行了内部分类，而且对其中某些小类还进行了同、异的比较。^③当然在研究深度上，该著还只是从修辞的角度泛泛而论，浅尝辄止。

四、存在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①只停留在动量词的立类和分类上；②只是就动量词而论动量词，没有从动量词与动词的组合选择上探讨其内在规律。究其原因，这显然跟开创阶段只着眼于体系建构的研究倾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主观上认为动量词和动词的组合是“习惯搭配”^④有很大关系。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汉语语法研究，主要关注结构

① 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②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6~282页。

③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8~418页。

④ 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8页）在讨论动词和专用动量词的组合规律时，曾明确指出这种组配“总是凭习惯而定”的。

和形式,很少触及功能和语义,而动量词虽然语义上比较复杂,但形式上却十分简单。这样,在这种以形式为重心的研究思路的指导下,人们所能做的当然只是对动量词的简单分类而已。要使动量词研究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和进展,必须把它们放在与动词组合的动态立场中,从语义出发去研究其内在规律。

第二节 中期的动态研究:语义特征与双向选择

一、语义特征分析的引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语义特征分析的兴起,动量词与动词的组合研究才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首推马庆株。他的《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一文从动词的语义特征出发,分析了动词的类对后面时量成分所指的影响。虽然该文还只是着眼于个别格式的个案探讨,但这种研究对整个动量词研究的影响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一,首次确立了从组合的角度探讨动量词的研究思路;第二,首次明确了动、量组合^①过程中动词的决定性作用;第三,首次开启了从动词的语义特征出发探讨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的研究思路。在该文的影响下,以语义为重心,以动词为视点,从组合的角度探讨动词与动量词及其相关成分的组配,已成为此后一个时期内该课题研究的主旋律。

(1) 对动词小类与动量词小类组合规律的整体探究。例如,李临定《现代汉语动词》从动词的语义类别出发,对动词小类与动量词小类的组合进行了全面探讨。^②虽然这里的研究还只是勾勒性的描写,但它第一次从语义层面向人们展示了动、量组合的基本概貌,该研究对今后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① 本书所提到的“动、量组合”均指动词和动量词的组合。

② 李临定:《现代汉语动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72页。